

軟硬件兼備 數據為證

——香港會展業蓬勃發展邁向新里程

維港觀瀾
董光羽

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剛剛結束，這個近年每次都吸引近百萬人次入場的年度盛事，萬人空巷的場面是香港蓬勃發展的會議及展覽（會展）業的寫照。會展業對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香港一向十分重要，香港書展主要面向港人，帶動的經濟效益尚且不小，面向國際、以企業及旅客為對象的大型會議和展覽，為香港所創造的經濟價值，更是不容小覷。

香港會展業非常蓬勃

在特區政府大力推動下，香港會展業的發展確是愈見蓬勃。遠的不說，單計今年夏季，香港已是熱鬧非凡，由7月3至7日一連五天在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的「第108屆獅子會國際年會」，到7月8至10日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行的「LEAP East 2026國際科技與資訊技術展」，再到香港書展，以及緊接在7月24至28日舉行的「香港動漫電玩節」，單是7月，香港的會展業已是熱鬧非常，預計可吸引大量市民和旅客參與。

當然，以上僅是香港會展業盛況的「九牛一毛」，香港每年都會舉辦多項大型國

際會展活動，包括「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亞洲金融論壇、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香港金融科技周、香港國際文化高峰論壇，以及巴塞爾藝術展、設計營商周等極具吸引力的藝術及設計活動。另外，每年在香港舉辦的國際貿易展覽中，有超過十個更是相關行業（包括電子、珠寶、禮品、鐘錶及燈飾等）在亞洲以至全球最具規模的展覽。

會展活動吸引大量高增值旅客

這些世界首屈一指的會議及展覽，每年都吸引數以十萬計的參展商和旅客來港，直接創造包括場地設計及布置、場地租金、運輸物流、住宿等收入，更會帶動零售、交通、餐飲及其他旅遊相關的產業，對香港的經濟非常重要。以2025年計，會展旅客的人均訪港消費為7470港元，較一般過夜旅客高36%。長途旅客平均停留時間較長、支出較多，對香港的經濟貢獻更為顯著。

有見於會展業對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角色和定位愈來愈重要，特區政府於2023年7月首次推出「定期展覽獎勵計劃」，提供場租獎勵，吸引不同規模的本

地和國際展覽持續在港舉行，涉及總金額逾12億元。2024年，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施政報告提出再撥款5億元推出「定期展覽獎勵計劃2.0」，為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亞洲國際博覽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或西九文化區舉辦的合資格國際展覽主辦單位，提供相等於百分之百場地租金的獎勵，每場展覽上限為1000萬元。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亦預留一億元試行與相關機構合作，聚焦吸引具備嶄新元素的大型國際展覽來港。

政府持續支援會展業發展

政府支援會展業健康發展的措施，可謂其來有自，皆因推動會展業持續發展，對香港來說確實事有可為。首先，香港擁有完善的交通基建和網絡，而這正是發展會展業不可或缺的一環；以香港國際機場為例，這個讓香港市民引以為傲的基建，早前便在「Global Travel Awards 2026」中贏得「全球最佳機場」殊榮；而在另一排名榜「Skytrax 2026全球機場大獎」中，則位列全球第4位，成績較去年上升兩級。

根據香港機場管理局早前公布的航空交通統計數字，香港國際機場今年上半年客運量同比上升11.7%至3280萬人次，飛

機起降量增加4.4%至200685架次。香港國際機場的運力強勁、設施先進、服務優質，自然令來港參與會議及展覽的客人賓至如歸。

除了香港國際機場這項級設施外，香港的公共交通網絡同樣是世界一流。根據國際諮詢公司聯同美國大學制定的《城市流動就緒指數2024》，香港的公共交通系統也在眾多國際大城市中排名第二，綠色運輸系統更是亞洲第一；另外，英國《Time Out》雜誌於2025年進行指標調查，由當地人對當地公共交通，包括巴士、鐵路及電車等作出評分，其中香港的公共交通系統全球排名第一。

增建會議及展覽硬件 為會展業擴容

而在會議及展覽場地方面，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亞洲國際博覽館，以及西九文化區，均是國際知名、獲獎無數的展覽及會議場地，基建及服務都達世界級水平。而為鞏固香港會展業優勢，特區政府更持續推行多個增加會展設施供應的項目，包括重建灣仔北三座政府大樓、告士打道花園及港灣消防局用地為會展設施、酒店和寫字樓，以及擴建亞博館等。其中，亞博

館擴建工程預計在2028年落成，各重建項目預計共提供額外63750平方米的可租用會展面積。

總結今年上半年，已有逾百個大型會展活動在香港舉行；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至5月份，訪港過夜會展旅客較去年同期上升足足12%。由於下半年尚有多項國際會議及展覽陸續登場，內容涵蓋醫療、工程、保險、物流、珠寶首飾和體育等不同範疇，相信定能進一步吸納高增值過夜旅客來港。

百舸爭流，奮楫者先；千帆並舉，勇進者勝。香港用最優質的軟硬件，以及最可靠數據，向世界證明自身具備持續推動發展會展業的能力；每一項優勢，都是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有為施政、社會上下一同努力的心血結晶。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貿易中心地位，會展業對此可說是至關重要。特區政府全方位支援會展業「做大做強」，未來亦一定會繼續朝此方向邁進，推出更多適切的支援政策，不斷提升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優勢。

時事評論員

《北都發展條例》樹立發展立法新範式

議事論事
鄧凱

《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日前刊憲，並提交立法會首讀及二讀，立法會正審議條例草案。這部被寄予「拆牆鬆綁」厚望，提速提效北都建設的專屬法例，從行政長官提出立法構想到草案成形，不過9個月。條例草案的重心首先落在「快」字之上，六大政策範疇包括簡化城市規劃程序、加快支付收地補償、便利跨境要素流通等的法定賦權框架一次展開，如此進取的革新力度在香港立法史上並不多見。

進取與克制的最佳平衡

「進取」的證據確乎充分。例如，條例草案第6條開闢了有別於《城市規劃條例》第12A條的簡化城規路徑；第7條將土地或建築物臨時用途期限延長至7年，變通現行規定。又如，第12條就《建築物條例》第42（1）條的「特殊情况」門檻作推定滿足安排；第15至17條以績效為本模式重构建築噪音許可證制度。再如，第18至21條為跨境要素流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法律規管基礎，等等。凡此種種，繪製出一幅以便利北都建設之名的促進型立法圖景。

然而不止於效率與改革敘事，這部條例真正值得稱道的是，其建章立制仍舊保持了必要克制，客觀且務實地回應了坊間關於香港將存有兩套發展標準以及「雙軌制」、「平行法」模式會否不利於整體法

治的異議。從立法技術的角度上講，條例草案在制定賦權規範的同時，也嵌入了四重自我約束裝置。進取與克制之間的張力，恰是我們觀察和評價北都立法的最佳切入點。

以法律形式固定北都地理空間

條例草案第3條及附表1將北都範圍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第24條進一步授權附屬法例可訂明僅適用於北都內的指明範圍、工程或行業。這意味着，法律變通試驗被主動圈定在特定的地理空間之內，全港既有的城市規劃、收回土地、建築管制秩序等原封不動。**北都專屬法與一般法例之間由此構成一種附條件的例外關係：北都土地在符合條件時適用簡化程序，不符合條件或位處北都之外則回歸常規路徑。這意味着北都範圍內的「特事特辦」不致外溢為全局性的規則鬆動。**

在法理上，此種樸素安排標示出「一區一法」與「以區改制」之間的本質區別。前者是在既有法秩序之上以劃定物理界限的方式創設有限的法律例外（legal exemption），後者則「企圖」以區域為突破口系統性地改寫全局規則。前者即北都法模式較後者而言顯然更為「矜持」。此外，條例草案明文排除保育地帶適用簡化程序，政府亦表明現階段無意擴大適用範圍，特別法的訂立絕不以「全盤鬆綁」的法治失序為代價，其間分寸拿捏頗見功力。

「主附」雙層立法結構保障賦權的確定性

條例草案採取「主體法例定框架、附屬法例填細節」的雙層結構，六個政策範

疇由第3部各分部以明文列舉，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只能在既定框架內制定行政規則，而非進行完全開放性的賦權，再度體現了謙抑的品格，更保障了法律本身的確定力。誠然，另一項超出法律文本之外的安排也引人關注。據悉，首批五條附屬法例的草擬本隨條例草案一併提交立法會預覽。須知，附屬法例的正式提交須待主體法例通過之後，「預覽」並非法定程序的組成部分，應當視為行政機關主動讓渡立法透明度。此舉的效果在於立法會在審議主體法例時，已能預見賦權將被如何行使，權力行使的邊界在賦權之時即已具象化。

在授權立法的比較法實踐中，行政機關往往傾向於在獲得框架性賦權後才逐步披露行權細節，議會角色故而時常滯後於行政決策。然而，這次「邊授權邊亮底牌」的做法，將附屬法例的草擬本提前置於議會視野之內，使立法會的審議不再停留於抽象的框架授權層面，而能深入到具體行權場景的檢視。特別是，在行政主導的憲制格局下，當行政機關手握政策議程優勢而不恃，反以預覽方式主動向立法會交底，將行政立法之間的賦權關係從單向的信任交付，轉為可核驗的政治協作，這對於香港踐行行政立法相互配合之關係的意義不言而喻。

行政效能的內部提速並不偏廢程序監督

條例草案第4條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修訂附表1所載的北都範圍，但此項調整權受到兩重限制：一是僅在指明情

況下方可行使，即北區或元朗區行政區界線變更，或相關分區計劃大綱圖界線變更；二是修訂公告須經立法會「先訂立、後審議」程序方可生效。那麼，這是否隱含著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壓縮程序冗餘保留有效監督

確實如此。人們容易將「提速」簡單等同於「放鬆監督」，但細讀草案可見，被壓縮的是行政審批的內部流程時限，如城規會的審議周期由九個月縮至兩個月、建築噪音許可證的續期頻率因有效期延長而降低，而非立法監督環節。附屬法例依然須走「先訂立、後審議」的法定路徑，立法會保留修訂或廢除之權。壓縮的是「程序冗餘」，保留的是「外部監督」，這個區分至為關鍵。某種意義上，草案對行政效率的做功是「向內」的，指向官僚體系自身的流程再造，而非「向外」削奪議會或公眾的監督空間。事實上，簡化後的城規程序仍要求技術評估與為期三星期的公眾查閱，城規會的把關職能並未弱化；暫支款項的利息安排也保留了土地審裁處在特定情況下命令不予適用的司法介入空間。可見，提速的對象始終是行政效能的內部梗阻，而非外部性的程序監督。

定期檢視帶來法制系統的持續校正

除以上三項約束裝置之外，立法者還在時間維度上發揮能動性。發展局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承諾，將定期檢視條例及附屬法例的執行安排，定期向行政長官

主持的北都發展委員會匯報，並每年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匯報落實情況。改革由此被置於持續的回訪機制之下，而非一次性授權後便脫離公共視野。不限於行政問責，該舉措的積極價值還在於它為制度調整預留了「動態校準」的必要空間。

北都建設是一個長期工程，法制供給不可能一勞永逸，定期檢視機制至少在原則上承認了該事實。附屬法例可分期制定、審時度勢的設計，亦與此邏輯一脈相承。跨境數據流、物資流及資金流的附屬法例細節尚未納入首批提交範圍，正是決策局仍在研究和策劃的坦誠表述，這種「不貪多求全」的立法節奏本身也構成一種時間維度上的節制。

那麼，應當如何整體評價這部條例草案？筆者認為，它的真正價值不在於為北都建設開了多少綠燈，而在於它示範了一種可能性：真正的發展型立法不是一蹴而就的破舊立新，而更應當考慮漸進式的法制供給側改革。相比於域外不乏特別立法因賦權過寬、邊界模糊而引發合憲性爭議的教訓，北都條例草案所呈現出的立法美德恰恰在於，既以法制進取為北都建設注入動能，又為賦權設限、為提速設防，以確保這股動能運行於整體法治的軌道之內。進取是勇氣，克制是智慧，法治的美德藏於二者之間。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與人權論壇高級研究員、法學博士

英國脫歐十周年：悲劇何以發生？

看大勢
宋魯鄭

震動世界的英國脫歐公投已經十周年，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民眾也終於認錯。多個民調顯示，60%的英國人認為失敗，認為正確的只有30%。希望重返歐盟的比率高達56%。

十年間，英國付出的代價是慘重和全方位的。政治上，10年走馬燈般更換了7個首相，一再上演的政治危機令穩定性、可預期性不復存在。社會撕裂也由於支持和反對者相互敵視達到了二戰以後最嚴重的程度。經濟上則增長疲軟，貿易受阻，據測算，較留歐基準縮水6%至8%，商業投資下降12%至18%。對歐核心商品出口下降16%。通貨膨脹也高於歐盟。2023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證實，英國是G7集團唯一一個經濟規模未能恢復至疫情前的國家。

在這種情況下，生活成本大幅上升，特別是食品價格累計上漲38.6%。普通家庭年均損失2500英鎊。最反諷的是，脫歐目的之一是為了減少移民湧入，但結果卻是不降反大升：從脫歐前的33萬飆升至95萬的高峰。脫歐支持者所追求的「全球英國」反倒是在移民問題上實現了。

英國是一個以保守和理性著稱的國家，何以會犯下如此低級的戰略性全局失誤？特別是在投票前，大量經濟學家、國際機構和頂尖學者都已經準確預測了脫歐後果，也發出了極其詳盡的警告。現在回頭看，脫歐派人物邁克爾·戈夫的名言：「這個國家的人民已經受夠了專家」成了最大的諷刺。

搞公投犯下愚蠢錯誤

現在一般認為脫歐悲劇是多種因素造成的。政治上，當時的首相卡梅倫為了應對國內政治危機以及加大對歐盟談判籌碼而犯下愚蠢錯誤。英國本已有成熟和深度認可的代議制，為什麼還要搞公投？更何況21世紀以來歐盟國家舉行的公投都是負面結果。2005年，法國和荷蘭公投否決了《歐盟憲法條約》——沒有多少民眾看過這個條約，只是因為對政府不滿才投反對票。歐盟不得不另外制定了《里斯本條約》，隨後法荷兩國均改為議會表決的方式才得以通過。

從地理位置和民族心理上講，英國孤懸歐陸本土之外，和歐洲的關係一向疏遠。19世紀晚期更奉行對歐洲不干預的「光榮孤立」政策。二戰後當法德推動一體化時，

英國仍將美國視為決定自己命運的歸宿而不是歐陸。甚至1960年代英國為對抗歐共體而牽頭成立歐洲自由貿易聯盟。所以當英國最終決定要加入時，兩度遭到法國否決，直到1973年才入盟。但英國仍然扮演消極角色：不加入歐元區，不加入《申根協定》，1992年還曾退出歐洲匯率機制。2016年2月即脫歐前三個月，還迫使歐盟同意英國享有「特殊地位」，即允許英國在不加入歐元區、不參與政治一體化的前提下保留在歐盟單一市場中的特權，即在移民、主權和經濟方面的例外特權。可以說即便加入，它也不是一個歐盟的建設者，而是攪局者，阻撓者，最終以脫歐的方式給歐盟一體化重重一擊。

從外部因素來看，則是歐洲應對「阿拉伯之春」犯下戰略失誤引發歐洲難民危機，德國又實行無限制接納難民的政策，並推動歐洲各國實行分攤政策。從而成為推動脫歐的「最後一根稻草」。

客觀而言，這些都是英國脫歐的因素。但面對一個全局性的戰略性失敗，以上因素並不能夠解釋其根源，這還需要審視英國文明本身。

從根本上講，保守和理性並不是英國國民性的基本特徵。歐洲第一個砍掉

國王頭顱的國家是英國，最早發生共和革命的國家之一也包括英國，比以激進著稱的法國早了近一個半世紀。英國還是世界上第一個發生工業革命的國家，最早完成社會現代轉型，是對幾千年人類社會顛覆性最大的一次衝擊。這可絕稱不上保守。

短視與傲慢不斷上演

至於類似於卡梅倫這樣的非理性政治愚蠢，英國歷史上也不斷上演。像短視與傲慢失去富庶的北美殖民地、自私與愚蠢對納粹德國實行綏靖、對世界和自身實力完全誤判與錯估發動蘇伊士運河戰爭。這其中，最類似於英國脫歐的事件則是二戰還未結束時的英國大選。

第一，丘吉爾的自負和卡梅倫相似。

當時德國雖然已經投降，但二戰仍未結束。確定戰後秩序或者說強國瓜分世界的波茲坦會議正在舉行。對於實力受到嚴重損害的英國來講，非常需要丘吉爾的威望和經驗。因此，即使是反對黨工黨領袖艾德禮都支持日本投降後再舉行選舉。但當一些工黨高級官員要求盡快舉行選舉時，丘吉爾不顧所有人的反對居然同意了。在他看來，自己根本不可能輸掉選舉——這

和卡梅倫同出一轍。結果卻是震驚世界的敗選，導致英國在波茲坦臨陣換主帥。正如當時的陸軍元帥布魯克所說的：「在這個世界性的歷史時刻舉行選舉，這是多麼可怕的錯誤。」「（他）要是能聽進去任何建議，無論如何也能把首相做到年底。」後來丘吉爾本人也坦承：「哪怕乘飛機被殺，或者像羅斯福那樣死去，也要好得多。」

第二，選民的選擇和脫歐一樣超出想像。

丘吉爾拯救了英國，但在戰爭還沒有結束時民眾就將他拋棄。無論是從國家利益還是道義情感，都令人難以理解。正如英國在波茲坦會議最重要的職業外交官卡多根爵士所評論的：丘吉爾失敗「表現出英國人民卑劣的忘恩負義」，是「對我們國家真正的羞辱」。當時參會的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面對這一不可思議的結果委婉感嘆：「顯然人們需要對英國的生活方式進行更深入的理解」。

因此，從英國文明特性的角度，脫歐並不令人意外，它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英國的最後一次。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